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育

——国情·需求·规划·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规划办公室

周贝隆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育

——国情·需求·规划·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

教育规划办公室

周贝隆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在国家教委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研究咨询报告《2000 年的中国教育》的基础上写成的。此项研究成果荣获 1988 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本书内容反映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六五”期间的全国重点项目“专门人才预测和规划”，“七五”期间的全国重点项目“全国教育规划和宏观控制机制研究”的基本成果。这些研究项目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本书内容包括：我国教育发展历程和现状；人才需求预测；我国教育发展规划和展望；关于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方针政策的思考。

本书对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比较深入，对教育理论的概括比较系统。本书对从事教育决策、教育管理，教育理论研究工作和人员以及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干部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广大教师和教育系的学生及关心我国教育、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员也有参考价值。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育

——国情·需求·规划·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规划办公室

周贝隆 主编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 插页 1 字数 340 000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4 231—14 242

ISBN7-04-003213-9/G·195

定价 8.55 元

(精 装 本)

序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之一，就是使我国的经济建设有可能在总体上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当前的治理整顿和围绕治理整顿的深化改革的目标就是，使经济建设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发展的运行机制，从总体上已确定为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很显然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可能，并且应该做到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并与经济建设和整个社会发展相协调。

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要使教育事业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并与整个建设事业相协调，并不容易。古人讲过，“预则立，不预则废”。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更是如此，在我们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与教训之后的今天，对未来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预测应该说是有可能的。教育事业周期很长，更需要增加预见性，尽量减少盲目性。一个学校的立与废所需要的时间不亚于一个大中企业，不可不慎。它的发展不允许也不可能只依据眼前人才供需的矛盾，去自发地调节。现在毕业生分配中暴露了不少矛盾，除了人事政策上的原因外，不能不说是那种不讲前提条件的所谓“广开学路”所带来的盲目的“高教热”等等的回答。当然要求对未来教育的社会需要和条件作出十分精确的预测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总比不经科学论证、无计划地盲目地发展要好得多，现在该是取得一致认识的时候了。特别各级负责宏观指导的领导部门尤其要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还会不断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我们人才预测工作是从1983年开始的。对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教育作了统筹的研究，动员了巨大的人力，对2000年前的教育，实际上是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前半叶的教育、奠基的教育作了预测和论证。这比过去国家计划中只有一个招生的总数那种状况前进了一步。我们不能说这项工作已经结束了。有些地方还缺乏应有的工作，不少地方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也还需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订。此外这些成果如何运用于规划，特别是如何能解决与年度计划的矛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毕竟已具备了一个较好的开端，这书记录了这样的进展。

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各行业部门、各级地方主管部门提高宏观决策的科学水平，是有所裨益的。

何东昌 1990.3.4

前 言

面向未来,是教育的特点,也是其重要性所在。本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教育,正在为我国二十一世纪前半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进行劳动力素质和人才的准备。教育发展的成效及其指导原则的功过,要根据今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评价。

我们关于教育发展的研究是从1982年开始的。当时国务院调整机构,倡导中央国家机关向宏观管理转变职能。此后,由张承先、何东昌同志主持的教育部新党组,把加强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改善宏观决策放在突出的地位,决定成立教育规划研究室。

1983年7月,在万里同志的支持下,教育部会同国家计委等综合部门牵头,由国务院各部门分工,组织了规模上覆盖全国的专门人才规划工作。同时,对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形式的教育,以及教育的发展战略等开始进行统筹研究,并且在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的系统工程专家们的直接参与下,进行了全国2000年教育发展规划的模拟计算。在此基础上,作为“2000年的中国”研究的一部分,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2000年中国的教育》咨询研究报告(1984年12月)。并将这个报告提供给为中央起草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同志参考。该报告提出的思路 and 主要观点,迄今仍然是本书的基础。《2000年的中国》研究获得了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该报告也得以分享这个荣誉。这是对为之共同做出贡献的人们的报偿,也是对软科学研究的鼓励。

从1985年6月开始,在何东昌同志亲自主持、推动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开展了地区人才需求预测和制定1986—2000年十五年地区教育发展规划的工作。此后,国家教委又抓了辽宁、贵州两省作为典型案例示范。尽管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这是必然的),几年来在分级决策、分区规划的实践方面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在需求预测、教育规划的理论 and 实践方面都有丰硕的收获,从而丰富了我们对于国情、对改善宏观管理机制问题的认识。

1982年以来的人才预测及教育发展研究是有着深远意义的。根据国务院的安排,《2000年中国的教育》研究应当整理成书出版。但是,五年过去了,理应根据新的实践加以充实发展,停留在原来的地方就显得不够了。本书进一步从近五年的实践中汲取营养,深化了对规律性的认识,努力进行较系统的理论概括,此外,数据处理和分析也力求缜密。在本世纪最后十年到来之际,我们决定以《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育》的面貌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得以形成,首先应当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倡导和全国各地、各部门千百万人的实践。同时,也要感谢不胜一一枚举的,给予过合作、支持的同志们。何东昌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一贯地给以支持、关怀和指导,对这项工作得以坚持下来起了关键作用。本书由周贝隆同志主编,参加书稿撰写、整理和数据处理工作的还有杜中一、王佩君、王祖怡、姚炳虞、葛华(第一章);王乃学、周高宇、赵江、张宇贵、林云裳、蔡耘(第二章);白景龙、杨晓青、彭卫平、林云裳、蔡耘(第三章)诸同志。周承业同志自始至终协助周贝隆同志组织领导了整个课题的工作,并且对书稿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发展没有止境,研究还要继续。本书所提出的论点正确与否,要由今后的客观实践来检验。编者诚恳希望广大读者以研究、批评的眼光来审视本书,并且热诚地期望更多的人参加到这方面的研究中来,为我国教育发展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做出贡献。

编 者

1990.1.3

目 录

第一章 我国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1
一、 历史的回顾	1
二、 我国教育的现状	17
第二章 人才需求预测	53
一、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教育	53
二、 人才预测的任务和指导思想	58
三、 我国专门人才现状及初步分析	67
四、 2000 年全国专门人才需求预测	85
第三章 我国的教育发展规划和展望	112
一、 规划的原则和思路	112
二、 我国的基本学制和管理体制	118
三、 1983—1984 年对“2000 年中国的教育”的规划和研究	122
四、 地区规划与分级决策——地区十五年（1986—2000 年）教育规划工作	140
五、 2000 年全国基础教育（普通中小学）的发展前景	143
六、 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前景	158
七、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前景	165
八、 基础教育师资和师范教育规划	176
九、 教育经费	180
第四章 关于我国教育发展战略、方针政策的思考	194
一、 教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使命	194
二、 教育发展战略，发展前景	196
三、 教育投资	199
四、 基础教育	203
五、 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	208
六、 其他	211

第一章 我国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一、历史的回顾

1. 1949 年前, 我国的现代教育基础十分薄弱

我国教育已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 但直至本世纪初, 均是以学习古代语文和读经 (主要是儒家经典) 为内容的旧教育, 其目的主要是为提高统治阶级的文化教养和巩固统治政权服务, 与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几乎无关。现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在西方是近两百年的事。欧洲工业革命开始以后, 科学技术显示出巨大的生产潜力, 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 对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劳动者的需求日益迫切, 于是相应出现了以传授现代文化科学技术知识为主, 其教育不仅面向上层统治阶层, 而且逐步面向劳动群众的现代学校教育。在欧洲, 早在十九世纪初, 资本主义国家即以政府法令着手建立现代学校教育网。如英国始于 1802 年, 俄国始于 1803 年, 法国是 1806 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起步比欧美晚了半个多世纪, 但他们抓了“教育立国”, 高水平的教育为以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可以说, 现代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建筑在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和普及的基础上的。没有现代的学校教育和基础教育在劳动群众中的普及, 就没有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

我国的现代教育, 于本世纪初才开始, 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整整晚了一个世纪。从清朝末年到民国, 由于帝国主义入侵, 政治腐败, 社会动乱, 教育发展十分缓慢,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基础还十分薄弱。由统治阶级把握着领导权的旧教育带有很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 劳动人民的文化教育程度极低, 1949 年, 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 全国青壮年中的文盲率高约百分之八十。

体现现代教育特点的新学制, 在我国, 最早的要算 1902 年的壬寅学制和 1903 年的癸卯学制。^①以癸卯学制为例 (图 1-1), 七周岁入学, 初小五年, 高小四年, 中学五年, 中学后高等教育还分为三个层次, 与中、小学教育衔接的单轨制普通教育并行, 还有从 12 岁开始的职业教育体系。从教学内容看, 中学开设修身、读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理化、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诸课 (见表 1-1)。可以看出, 不论学制和课程设置, 都不同于传统的古代教育, 它已具备了现代教育的基本特点 (对照表 1-2)。

1922 年, 当时的政府参照美国学制规定了六、三、三、四 (小学六年, 初中、高中各三年, 大学四年) 的学制^② (图 1-2), 以后一直沿用, 没有很大变化。

关于在我国实行义务教育的问题, 尽管清政府于 1911 年 6 月宣布实行四年义务教育, 民国政府于 1915 年又规定实行七年义务教育, 并于 1920 年制定了分八年普及的实施计划, 但据统计, 1946 年全国小学在校学生只有 2368 万人, 而当时 6—11 周岁的学龄儿童约有 6200 万

• ① 学制图录自: 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纂,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② 学校系统图录自: 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纂,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人，毛入学率仅为 38%。在旧中国，普及义务教育始终是一句空话。至于中等和高等教育，情况更不景气。1946 年全国仅有中等学校 5892 所，在校学生 187.9 万人；高等学校 207 所，在校学生 15.5 万人。受教育主要是富家子弟的事，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多被拒之学校门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为适应革命战争和建设的需要，教育事业面向劳动群众及其子女，有所发展和变革，但毕竟还是受到了战争环境条件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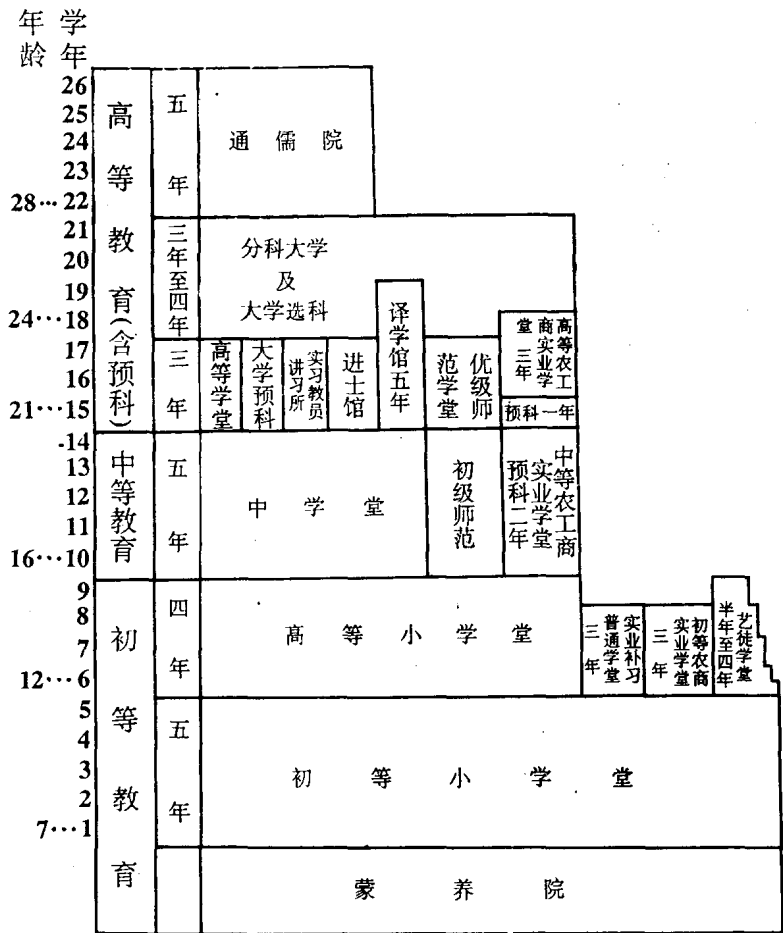


图 1-1 1903 年学校系统示意图 (癸卯学制)

表 1-1 癸卯学制：中学(五年)教学计划

周 学 年	科 目	修身	读经	中文	外语	历史	地理	算学	博物	理化	法制及 理财	图画	体操	合计
一		1	9	4	8	3	2	4	2			1	2	36
二		1	9	4	8	2	3	4	2			1	2	36
三		1	9	5	8	2	2	4	2			1	2	36
四		1	9	3	6	2	2	4	2	4		1	2	36
五		1	9	3	6	2	2	4		4	3		2	36

表 1-2 现行全日制重点中学(六年)教育计划

周 课 时 学 年	科 目	政 治	语 文	外 语	数 学	物 理	化 学	生 物	体 育	生 卫 理 生	地 理	历 史	音 乐	美 术	选 修 课	合 计
初一		2	6	5	5			2	2		3	3	1	1		30
初二		2	6	5	6	2		2	2		2	2	1	1		31
初三		3	5	5	6	3	3		2	2			1	1		31
高一		2	5	5	5	4	3		2			3				29
高二		2	4	5	5	3	3		2		2				4	30
高三		2	4	4	5	4	3	2	2						4	30

注：劳动技术课：初中 2 周，每周 4 节；高中 4 周，每周 6 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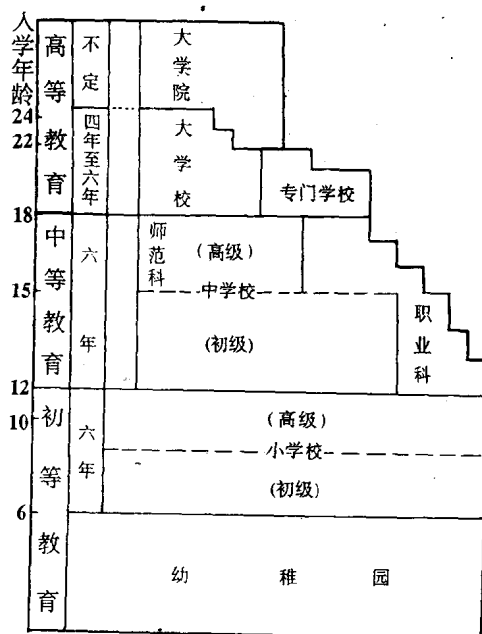


图 1-2 1922 年学校系统图

2. 新中国成立三十八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道路曲折

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需要，借鉴苏联的经验，立即着手对旧中国的教育进行改造，开创和奠定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教育事业也相应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三十八年来，我国普通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共为各条战线输送了 1200 多万高、中级专门人才。其中研究生 6 万人，大学本、专科毕业生 470 万人（相当于解放前旧中国三十八年（1911—1949）大学毕业生累计数 23 万人的 20 倍），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 800 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各类成人高等学校和成人中等专业学校为国家大批培养人才是近几年的事。从 1980—1987

年，这两类学校毕业生中，成人高等学校为 200 万人，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包括各种进修班、短训班结业在内共有 328 万人。

建国三十八年来的教育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1) 1949 年到 1957 年

这段时期是我国教育事业调整改造、加速发展、奠定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基础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办原国民政府所辖的各级公私立学校，接管了受外国津贴的大、中、小学校，收回了我国的教育主权，并立即着手对旧教育进行改造，特别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造就了一代新人。从基础教育的全面规划到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迅速扩大各级各类学校的招生规模，教育布局全面展开，形成了宏大的教育体系。大、中、小学在校学生成倍增长，为建国后几个五年计划有秩序的和以后的发展，成功地准备了人才，提高了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道路主要是学习苏联，并将我们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贯彻到学校教育中去，建立了政治思想教育体系。在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科和师范教育方面，加速了发展，较好地适应了以引进苏联技术装备的企业为骨干的工业化进程对人才的需要。

1952 年开始执行的高校院系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调整综合大学。

1951 年全国高等学校共 206 所，调整后，1957 年发展到 229 所。其积极的成果是将分散在不同学校的同类专业适当集中归并，迅速扩大招生规模，有利于提高学校的规模效益。如新的北京大学由原清华、北大、燕京、辅仁四校有关文理科系合并而成；原复旦、圣约翰、震旦、大同、浙大及其它院校的有关科系并入了复旦大学。工、农、医、师等院校也都普遍存在类似情况。与此同时，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从 1951 年的 15 万人（1949 年为 12 万人）增加到 1957 年的 44 万人，6 年时间增长近两倍（图 1-3）。平均每校在校学生数从 1951 年的 743 人增加到 1957 年的近 2000 人，其中工科院校达 3700 人。但是，当时的缺点是不加区别地一律调整，使一些条件较好的综合性大学失去了综合性，降低了学科水平，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提高，也造成了消极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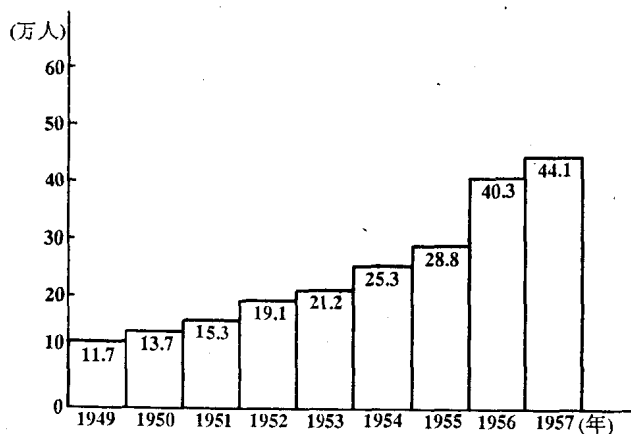


图 1-3 1949—1957 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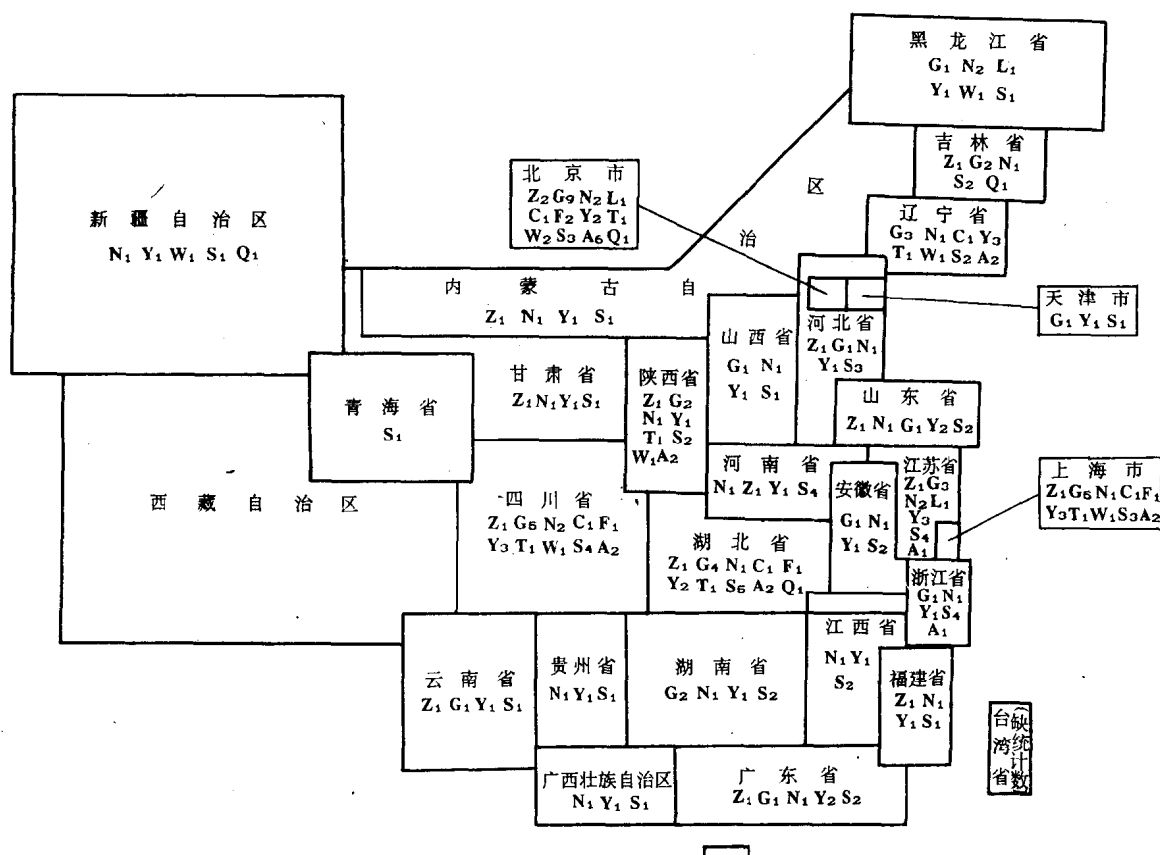


图 1-4 1957 年全国高等院校地区分布示意图

图例: Z——综合大学 W——语文院校 G——工业院校 C——财经院校
 N——农业院校 F——政法院校 L——林业院校 T——体育学院
 Y——医药院校 A——艺术院校 S——师范院校 Q——其它院校
 图中字母注脚为学校校数。

科类结构方面,为适应基础教育的迅速发展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师范在校学生比重倍增,工科在校学生数超过高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是,不适当地把文科有些专业砍掉,特别是财经、政法多数系科、专业受到了严重削弱,财经类专业不但学生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甚至数量也降到不足原来的一半,产生了新的结构失调(见表 1-3)。

表 1-3 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前后科类在校生结构比例对照

单位:人

	合 计	工科	农科	林科	医药	师范	文科	理科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调整前 (1951)	人数 153402	48517	9564	2436	21356	18225	11936	7801	25300	4225	180	3862
	% 100.0	31.6	6.2	1.6	13.9	11.9	7.8	5.1	16.5	2.8	0.1	2.5
调整后 (1957)	人数 441181	163026	33823	6065	49107	114795	19643	28660	12048	8245	3252	2517
	% 100.0	37.0	7.7	1.4	11.1	26.0	4.5	6.5	2.7	1.9	0.7	0.6

高等院校的地区布局有了显著的改善，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了师范、医药、农林、理工院校，艺术、体育、外语、财经、政法等院校则照顾大区分布，形成了比较配套的高等教育体系（见图 1-4）。

建国初期，为适应广大劳动人民子女受教育的需要，基础教育迅速发展。小学在校学生数从 1949 年的 2439.1 万人增加到 1957 年的 6428.3 万人（见图 1-5），毛入学率从 38% 增加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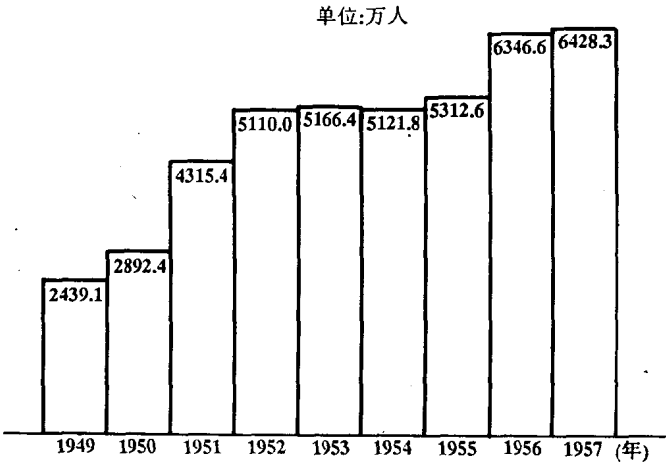


图 1-5 1949—1957 年普通小学在校学生数

80%。1957 年，初、高中在校学生数分别约相当于 1949 年的 6.5 倍和 4.4 倍（见图 1-6）。中小学迅速发展，但师资力量难以跟上，造成严重缺乏合格教师的状况。以小学教师为例，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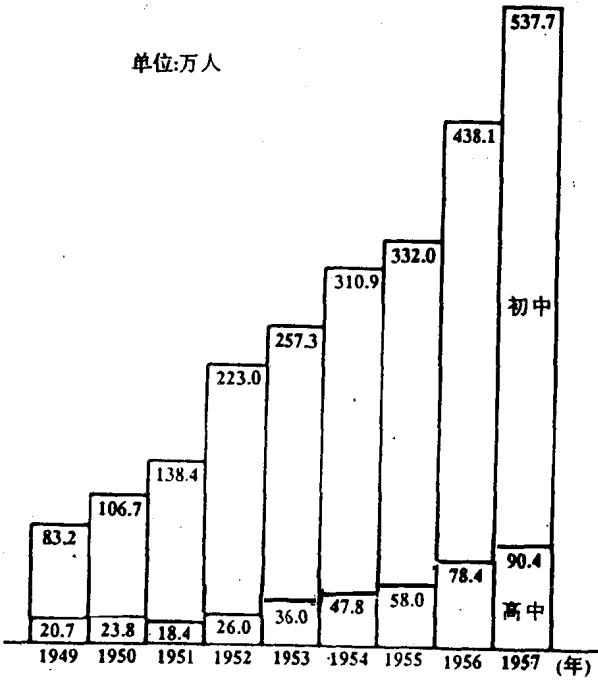


图 1-6 1949—1957 年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间净增 104.8 万人，而同期中师毕业生总计只有 23.1 万人，缺口 78%，计 81.7 万之多。而且 23.1 万中师毕业生并不能全部进入小学任教，相当一部分被拔高进入中学，变成了学历不合格的中学教师。在被调查的 1957 年的 181 万小学教师中，中师连同高中毕业（我国教育统计中，历来将高中与中师的毕业生一并计算。严格说，尽管文化程度相当，但普通高中未经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训练，总是一个缺陷）以上的仅 26 万，仅占 14.4%（见表 1-4）。而不到初中毕业水平的竟高达三分之一以上。中学教师也有类似情况，十分之一抽样调查说明，学历不合格的约占半数。

表 1-4 1957 年中小学专任教师学历构成

小学 单位： 万人：	被调查的 教师数	中师、高中毕业 及以上		初师、初中毕业及 中师、高中肄业		初师、初中肄业 及以下	
		人数	占被调查 教师数 %	人数	占被调查 教师数 %	人数	占被调查 教师数 %
		180.68 *	25.96	14.4	92.94	51.4	61.78
中学 单位： 人	被调查的 教师数	高等学校本科毕 业及以上		高等学校肄业 及专科毕业		中等学校毕业 及以下	
		人数	占被调查 教师数 %	人数	占被调查 教师数 %	人数	占被调查 教师数 %
		233,158 **	42,220	18.1	91,737	39.3	99,201

* 1957 年小学专任教师总数为 188.4 万人。

** 1957 年中学专任教师总数为 233,763 人。

中、小学的教学内容要求，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考虑我国原有十二年学制的特点不够，机械地搬用苏联的经验，把苏联十年制学校的教学内容拉成十二年，凡苏联不学的，我们就一律不学，再加上过分地强调减轻学生负担，从而不适当降低了教学要求，主要是语文、数学、外语的程度。

(2) 1957 年到 1966 年

我国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我国在经济上开始摆脱苏联，寻求自力更生、自我发展能力，在教育方面，也开始摸索我们自己办学的路子。前期的“教育革命”脱离了客观条件，忽视了教育发展的规律，在许多学校中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给教育工作带来了程度不同的混乱。在中央的及时察觉下，1961 年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总结了前期工作中成功的经验，汲取了失败的教训，压缩了教育事业的规模，纠正了 1958 年以来的一些“左”的作法和盲目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制定了《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教育获得了稳定的发展。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学术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

但是，由于“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还继续有所发展，教育上的一系列问题也就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从这一时期的统计数字更能清

楚地看到这一点。1957年，全国有高等院校229所，1958年“大跃进”一跃而增加为791所，一年几乎翻了两番，1960年达到高峰为1289所，以后经调整整顿，1963年剩下407所（图1-7）。普通高校招生数从1957年的10.6万一跃为1958、1960年的26.5万和32.3万人（见图1-8），分别超过了当年高中毕业生的数量（当年高中毕业生分别为19.7万和28.8万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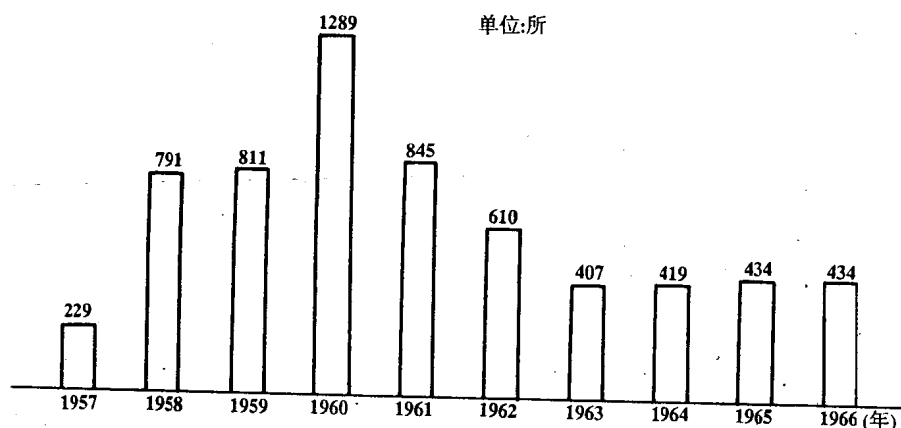


图1-7 1957—1966年普通高等学校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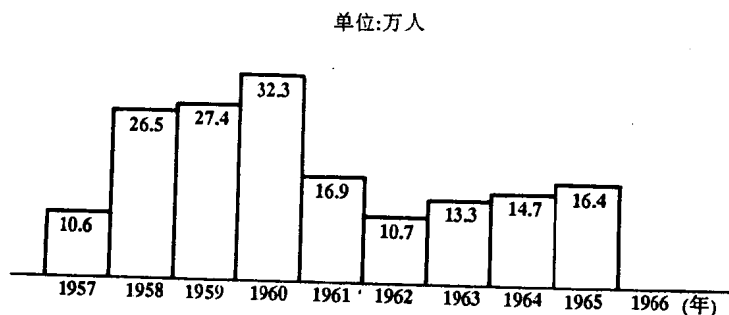


图1-8 1957—196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情况

量不具备条件的高校仓促上马（新增一千余所高校中，除个别学校外，多为中专戴帽），招生数又大大超过高中教育所能提供合格生源的可能，必然造成一度高等教育严重虚肿的现象，加以政治运动对正常教学秩序的冲击和经济困难时期的影响，不同程度影响了高等教育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在“大跃进”的影响下，1958年小学招生3000万人，在校学生8640万人，分别为1957年的2.4倍和1.3倍，中学招生434.5万人（其中初中378.3万人，高中56.2万人），在校学生852万人（其中初中734万人，高中118万人），分别为1957年的1.7倍和1.4倍。中、小学教育发展如此之快，大大超过了师资和经费的可能。1959年经过调整，招生人数显著减少，小学招生2049万人，中学招生384万人（其中初中318万人，高中66万人）。1960年又盲目发展，小学招生2494万人，为1957年的2倍，中学招生433万人（其中初中365万人，高中68万人），为1957年的1.7倍。1961年起贯彻“八字”方针，继续调整，控制发展，1963年

后，由于经济调整取得显著成效，教育推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一方面发展普通中学教育，另一方面加快发展农职业中学，使中、小学又有所发展。1965年普通中学在校学生934万人（其中初中803万人，高中131万人），比1957年增长48.7%，小学在校学生11,621万人，比1957年增长81%（见图1-9、1-10、1-11、1-12、1-13、1-14）。

(3) 1966年到1976年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育事业首当其冲，十七年的教育工作被彻底“否定”，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被歪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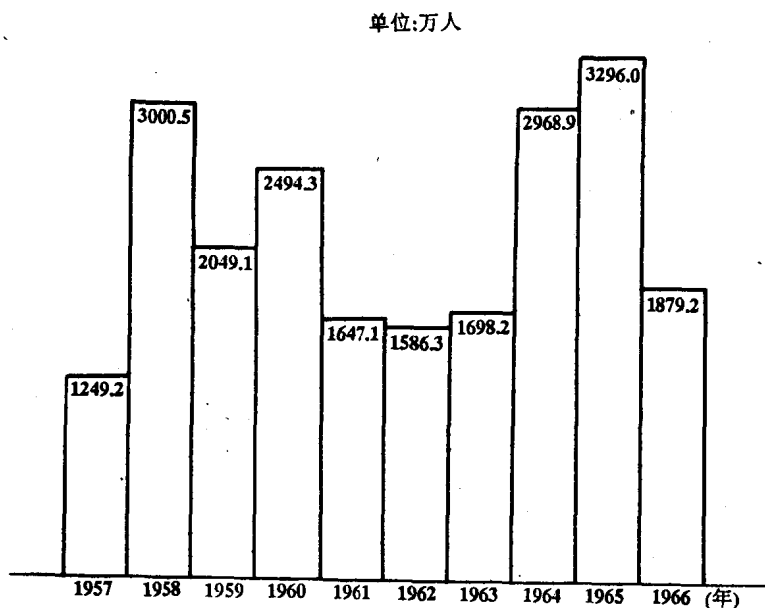


图1-9 1957—1966年小学招生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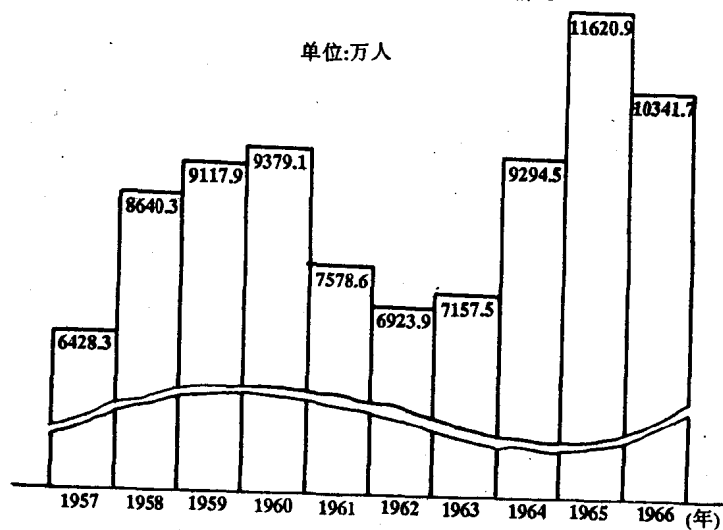


图1-10 1957—1966年小学在校学生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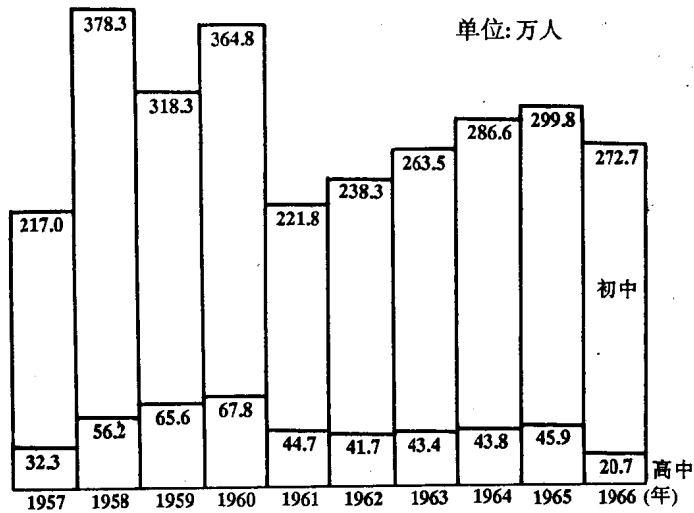


图 1-11 1957—1966 年普通中学招生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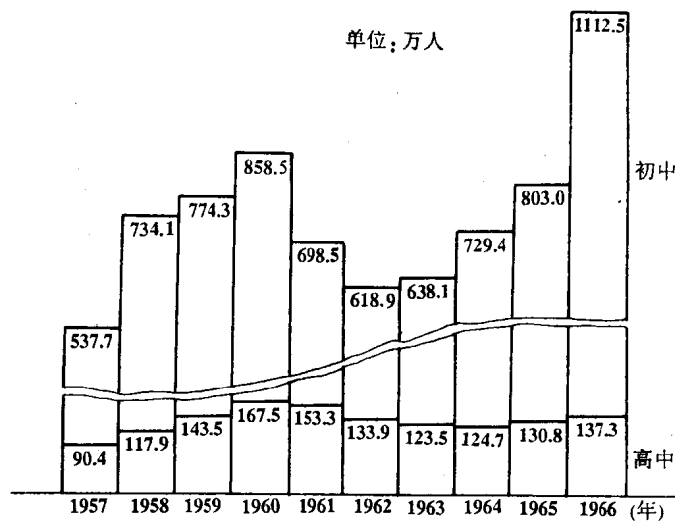


图 1-12 1957—1966 年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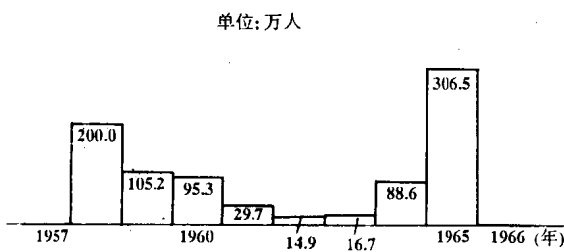


图 1-13 1957—1966 年农、职业中学招生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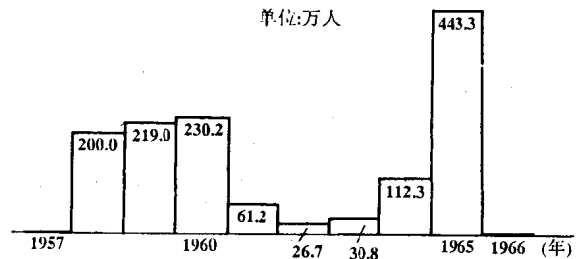


图 1-14 1957—1966 年农、职业中学在校学生人数

学校领导干部受冲击，教师队伍受摧残，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校舍大批被占用，图书、教学仪器设备遭到破坏和损失。1969 年开始，大批高等学校搬离中心城市，损失很大。有的虽

已重新建成可观规模，但耗资巨大。个别院校远离经济文化中心，给学校的发展造成长远的困难。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对高等学校进行“调整”，将原有434所高校砍掉106所，其中43所与他校合并。撤消中等专业学校17所，3所改为工厂。

这一时期的前几年，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都停止了招生，中断了教学工作，停课闹“革命”，搞“斗、批、改”，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搞“上、管、改”，使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为社会输送合格的毕业生中断了十余年之久。

据统计，1966年以前入学的在校大学生共53万人，虽因“文化大革命”未能按原计划学完规定课程，但仍作为大学毕业生分配了工作；1970年开始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先后七届共94万人，入学程度严重参差不齐，因而不得不降低教学要求，加上“上、管、改”的干扰，这部分学生未能受到应有的高等教育训练，作为大专毕业生走上了工作岗位。这两部分毕业生共计147万人。尽管他们中间不乏优秀人才，但作为整体来说，他们受到的高等教育是不完整的。1965，全国普通高校共招生16.4万人，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当年共招生27.3万人。其间，招生人数如按平均每年递增0.9万人计，11年应招生240万人，而实际只招收工农兵学员94万人，即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全国普通高校共少招学生约146万人（见图1-15）。由此可见，“文革”期间，少为国家培养上百万大学毕业生和二百多万中专毕业生，一度造成了各条战线青黄不接的状况。

“文革”期间普通中学盲目发展，再次加剧了基础教育的虚肿。另外，由于当时批判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大量砍掉了中等专业学校，取消职业学校，几乎全部办成了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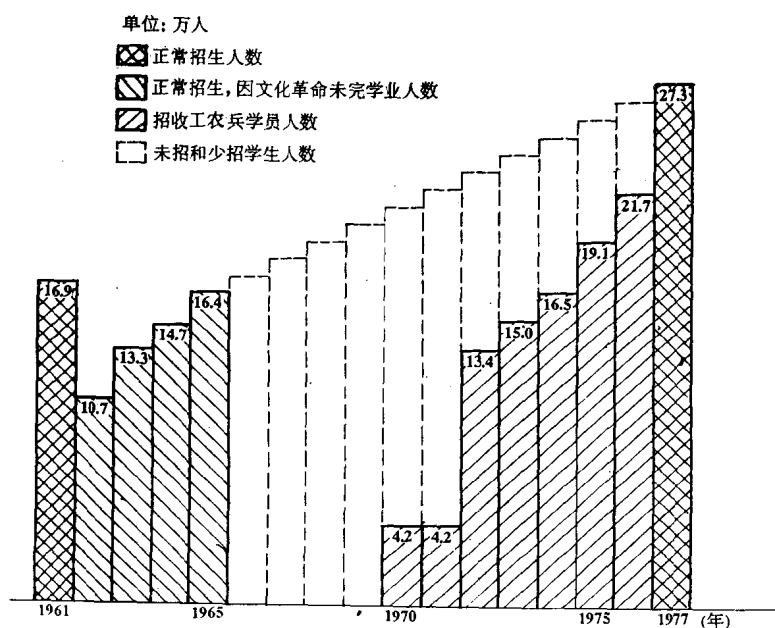


图 1-15 1961—1977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情况

通中学，中学教育结构单一化。初、高中招生数1966年分别为272.2万人、20.7万人，到1977年初、高中招生数分别增加到2367.7万人（相当当年12岁儿童2452.1万人的96.6%）和993.1万人，即初中增长7.7倍，高中增长了47倍（见图1-16、1-17）。从升学角度看，